

# 反向认知:自然主体论的思维范式阐释\*

张杰 余红兵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长期以来,在我国高校的外语教学及其研究中,认知活动一直被视为是人作为主体对客体乃至自然的单向度认识。其实,如果从大自然与人的反向关系来看,认知行为首先产生于大自然,没有大自然,人类的认知活动就无从展开。然而,自然与人之间究竟是如何展开反向认知的呢?客体是否真的能够拥有自身的独立认知呢?这一认知又是怎样表达的呢?本文以自然主体论为基础,根据《周易》、老庄哲学以及生态符号学中的相关理念,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也阐释了反向认知模式,从而指出“回归自然”是战胜人类认知局限、知识再生和提升思维能力的关键。

**关键词:**反向认知;自然主体论;精神文化符号学;老庄哲学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23)03-0043-09

DOI:10.13458/j.cnki.flatt.004940

## 1. 引言

我们在谈语言学习和文化习得时,主体的认知活动是一个终究无法绕开的话题。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外语教学及研究一直在遵循国外通行的语言认知和习得理论,如“输入-输出”模型、“母语主义”、标准语等等,从而试图把握外语教学客观的“认知规律”。实际上,这些都是基于包括“表征主义”(representationism)和“心灵计算主义”(computationalism)在内的哲学倾向,将认知活动预设为人作为主体对客体乃至自然的单向度认识,而由此获得的“正确认知”就被称为知识和真理。我们权且把这种由主体到客体的认知称为“正向认知”。甚至包括语言与文学符号系统研究在内的当代符号学,也多是在此预设的基础上对符号意义感知的表征和阐释进行探索。然而,随着符号系统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正向认知模式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比如,早在20世纪后半期,一场围绕语言符号表征的“遮蔽”与“去蔽”的探索就已经展开。解构主义者不仅颠覆了语言符号的表意功能,而且还直接导致了对现存知识话语谱系的质疑,甚至把知识和真理看成是权力的产物(福柯2021)。

人的认知不可能不受到时空的限制,更无法摆脱自身、社会和文化权力场的控制。其实,用人类有限的认知去把握无限的大自然,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根本不可能。在地球上,大自然用了大约45亿年的时间才最终孕育出了人类。人类自诞生之后,在自身进化和文明推进的过程中,貌似逐渐摆脱自然的限制,甚至以地球主人的身份,试图改造和征服自然。但人类在社会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同时,也越来越陷入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健康危机。这种危机还不只是涉及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更是关系到人的大脑作为一种自然生命体的维护。难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体裁演变史研究”(项目编号:21AWW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杰,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与文论、符号学;余红兵(通信作者),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符号学、语言与心智哲学、文化与传播。通信作者邮箱:njnubrandon@126.com

道大自然真的仅仅是被人类认知的对象吗?是否存在大自然对人的“反向认知”呢?在这样的语境下,基于自然主体论对认知模式进行探讨,成为精神文化符号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次探讨的目的,是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精神文化符号学的认知模式,并为我国高校的外语教学及其研究提供参考。从表面上来看,这种认知模式的探讨似乎与外语教学相隔甚远,但其实在“底层逻辑”上有着深刻关联。首先,主流的外语教学实际上已经是将语言视为脱离自然主体和自然语境的独立存在,像某种物品或外在技能一样被获得。其次,长期以来,外语人才、尤其是高校外语人才的培养过分局限于所谓“语言知识”的传授。外语教学在这两个层面所出现的问题,都是因为遵循了上文所说的“正向认知”。如果要尝试突破这种困局,我们认为反向认知是一个值得参考的路径。这个路径可以从精神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切入。

事实上,在当今的符号学界,自然主体论已经成为关注的热点之一。比如,当代美国著名符号学家、生物符号学研究的倡导者托马斯·西比奥克(Thomas Albert Sebeok)就坚持把符号活动(semiosis)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外的动物界,而且还构建了“建模系统理论”(Modeling Systems Theory) (Sebeok & Danesi 2000),从生物主体的“圜境”(Umwelt)<sup>①</sup>及建模方式等维度出发,揭示符号的意义。这一探索虽然已经把生态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仍属于正向认知的范畴,即人对自然意义的感知和表征。

在本世纪与上世纪之交,塔尔图符号学派也发生了“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转向:在研究以尤里·洛特曼(Juri Lotman)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学家理论的同时,积极探索雅各布·冯·乌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 1896-1944)的生物符号学思想,并通过“自然文本”(nature-text)分析等理论路径,尝试将上述两个方向融合。这一研究开始由“符号域”(semiosphere)转向了“圜境”,并且已经把“圜境”视为认知行为的发生器。虽然该学派没有正式提出“反向认知”的说法,也没有专门阐释反向认知与正向认知的互动,但是其有关“圜境”的论述和“自然文本”的分析方法,实际上就是把“圜境”看成是某种有生命力的“主体”,让符号意义通过回归自然得以释放。

这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部分理念(特别是“天人合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庄子哲学中的“吾丧我”(王先谦 2012: 19)和“用心若镜”(陈鼓应 2020: 234)就显然突破了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模式,实现了主体间性的互动,即把客体也视为是具有生命力的个性(张杰、余红兵 2022)。《道德经》中也明确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 2011: 66)。不难看出,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人是以自然为第一性的。自然至上与“丧我”是互指相通的。任何“我”的拙力都是徒劳的,只有“用心若镜”地看待自然界(客体),才有可能达到“天人合一”;而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作为自然的“天”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认为这些是典型的反向认知。然而,自然与人之间究竟是如何展开反向认知的呢?客体是否真的能够拥有自身的独立认知呢?这一认知又是怎样表达的呢?这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 2. 问题的反思: 正向与反向之间

通常意义上的教学活动(包括外语教学在内)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获取知识和提升思

维能力的一种认知活动。具体而言,这是学生了解世界(如某门外语),并通过对现象的感知,深入发掘其本质、探寻其蕴含的客观规律的认知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获得资源(学习外语)。因此,人的认识活动一直以来多被视为是由主体面向客体的意识投射过程,而获得的认知在经过实践证明后就被接受为知识或真理。西方学界虽然早已发现人的理性认知的局限性,充分发掘了非理性活动的重要作用,但似乎很少对人类认知活动的出发点产生过质疑。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感知活动,均是从人自身的主体出发的,而客体(或者说自然)则是被感知或认识的对象,不可能成为认知行为的主动发生者。

认识论哲学的创立者、法国思想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就曾经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他由此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被黑格尔誉为“现代哲学之父”。在笛卡尔看来,自我是无法被否定的,因为当这种否定或怀疑产生时,自我就已经存在了,认知主体是认识活动的前提。进入20世纪后,奥地利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859-1938)把人类认识活动的研究引向深入,区分了认识活动的两种思维,即自然思维与哲学思维。前者是指向事物的认识,后者则是对这一认识的批判。胡塞尔(1986: 7)曾明确指出:“生活和科学中自然的思维对认识可能性的问题是漠不关心的——而哲学的思维则取决于对认识可能性问题的态度。”胡塞尔所强调的哲学思维是对认识本身的思考,但仍然是把人这个主体作为认识行为的发生者。

在胡塞尔看来,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知识覆盖层的不断叠加,就如同一个层层涂脂抹粉的人脸,会使得本来的面目失真,人脸如此,世界亦是如此。因此,为了规避知识的“遮蔽”,胡塞尔不进行所谓的“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是转向了直观把握,直接观照事物的呈现,也就是把事物的认识视为对现象的不同感知过程。胡塞尔不再追寻事物背后的本质,而是要返回事物本身,即回归现象。这就是现象学方法。据此,不同维度的现象观察就可能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本质就是多元的而非单一,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认知的片面性。此后,现代西方哲学的很多派别都直接或间接继承了这种方法。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哈乔夫在现象学思维范式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人类迥异于科学思维的另一种思维形式,即艺术思维。利哈乔夫(Лихачев 1992: 3)指出:“科学总是在探索规律性,科学首先注重那些重复、相似和共同的现象,而却很少关注个别的现象。”这实际上是一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逻辑学思维范式,研究者寻找的是客观事物的共性特征,得出的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这位俄罗斯人文社科界的领军人物明确表示,艺术思维注重的是把看似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寻求揭示事物的本质,而是关注事物的现象,特别是非规律性和偶然性。显然,以艺术思维为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科学思维方法造成的“遮蔽”。

胡塞尔的同时代人、法国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更是走出了人类理性思维的藩篱,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理性主义,而且坚持一切从直觉出发。柏格森认为只有直觉才能体验和把握生命存在的本质,即“绵延”,后期又将其称为“生命冲动”。他充分认识到了人类理性思维的有限性和宇宙的无限性,明确表示宇宙是不受时间和经验约束的。然而,柏格森仍然是把人类作为认知行为的发生者,只不过强调的是非理性的直觉认知。

胡塞尔、利哈乔夫与柏格森都不同程度上超越了笛卡尔的认识论哲学。胡塞尔是从方

法论的维度对这一认知过程进行了哲学反思,利哈乔夫则区分了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迥异,而柏格森更是摆脱了理性思维的羁绊。然而,他们的立足点依然是把人类的认知活动视为是由主体到客体的认知,三者的共同点是把人作为认知的主体,即认知行为的出发点。其实,如果认真反思一下,这个出发点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这种用人类有限的思维模式,哪怕是直觉的方式,去把握无限的自然和宇宙,显然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匹配,无法走出语言表征的危机。

新塔尔图符号学派的蒂莫·马伦(Timo Maran)在《通向生态符号学的整一方法:自然文本的概念》(“Towards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of ecosemiotics: The concept of nature-text”)一文中,就曾经描述了自然文本分析方法是如何尝试走出表征危机的。他将自然文本分析视为是联系“圜境”与表征文本之间联系的研究方法,“把通过这两个对应物之间的意义关系形成的集合称之为自然文本(nature-text)”(Maran 2007: 280)。马伦指出,“与书面文本相比,自然环境的结构以及对其的感知是多模式的。因此,自然环境和书面文本之间并不是平等的对应关系,而是一对多的关系”(Maran 2007: 280)。显而易见,在自然文本分析那里,“圜境”既然是可以主动发出各种信息的主体,就必然会对应多个甚至是无数个符号文本。“新方法表现为在文化中再现自然以及在自然本身的符号活动中再现自然,这种双重分析框架的理想模式就是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Maran 2007: 279-280)这里不仅揭示了自然的文本化和自然本身的符号活动,更主要是强调符号表征要返回自然生态环境本身,在生态符号学看来,“圜境”是第一位的。乌克斯库尔及其追随者们已经开始关注认知活动的出发点,即一切从基于自然主体的“圜境”概念出发,以此来克服以人作为主体的单向度认知活动的局限性。

其实,人的任何认知活动均与大自然息息相关。认知行为首先产生于大自然,没有大自然的条件、赋能和反应,人类的认知活动就无从展开。以自然为出发点的反向认知无疑是第一性的,人的正向认知活动是第二性的,更何况人本身也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员。《易传·系辞上》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黄寿祺 2016: 689)这里的“无思”和“无为”就是要回归自然首先的位置,只有“任运自然”“任运自动”(王弼 韩康伯 2009: 272)才能达到“感而遂通”的效果。“无思”并非没有知觉,而是要让心态平静,尽可能地“去蔽”,排除任何杂念或主观片面性,达到“寂然不动”的境界。这种“无思”实际上比任何“思”都更需要人自身的意志力,是需要“实修”,即“修身养性”,才能够实现的。“无为”则是反对人为的狭隘干预,克服行为的片面性、目的性和刻意性,避免因“有为”而造成“人为”的“伪”。

精神文化符号学的认知模式就是要建立在自然第一性的基础之上,从反向认知出发,在正反向互动的过程中,来揭示符号的认知和表征活动。这种以自然为中心的认知模式就是要去除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人类只是自然界中的一员,甚至强调避免任何主观片面思想对人的大脑的侵入,提出人类“脑生态”的维护问题。实际上,只有在反向与正向的认知互动中,人类才可能避免理性思维的“遮蔽”现象,回归到自然或事物本身。这种互动过程首先发生于客体(自然),主体(人类)接受到客体的信息后,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再反作用于客体,由此滋生出特定形式的真理或知识。然而,这种真理或知识应该用自然的形态来表征,如具体的画

面、塑像、音响、实物等,而并非语言符号的直接表征。即便使用语言符号表征,也只是辅助的说明,而不是演绎、概括、归纳和总结,尽可能避免因人的主观推演所导致的认知片面性。自然现象既是认知活动的出发点,又是人类意识表征的最终形态。这就是精神文化符号学的自然主体论的思维范式。

### 3. 反向的认知:主体与客体之间

在教学活动中,由于正向认知思维范式的作用,主体与客体之间最基本的关系通常被视为是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实践关系。主体(人)是认识者和改造者,而客体(自然)则是被认识者和被改造者。当然,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互动的,即客体也能够产生对主体的反作用。然而,主体是认知行为的发生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主体认知与客体规律的相符就会被认定是学生应该习得的真理或知识。

然而,真理或知识产生的过程确实如此吗?从主体出发的认知行为,不可能不受到理性思维的局限,难免会导致认知的“遮蔽”。古希腊罗马时代,人类开始了“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本体论”探索。到了17世纪,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家深切感受到“本体论”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于是就进行了“怎样认识世界本质?”的“认识论”转向。到了20世纪,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等人在对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语言学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现任何认识又都是通过语言的表征而存在起来的,于是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该转向所探讨的问题就成为了“如何通过语言来表征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进入20世纪后半期,以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latt, 1943-)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等,又提出任何语言表征都离不开历史文化语境,推进了“文化哲学转向”。在我们看来,应该说大自然才是万事万物的信息源,作为主体的人则是被自然作用的接受者,当然这种接受不是消极的,可以是积极的。

那么在认知活动中,究竟主客体的关系如何?如果说客体(或作为客体的大自然)是第一性的,是认知行为的始作俑者,而人作为主体则是第二性的,那么这种反向认知又是如何展开的?究竟是大自然在等待人类的认知,还是人类的任何认知都源自大自然的作用?其实,只需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就不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人类诞生的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也不可能对大自然造成明显的破坏,因此大自然并没有提示人类要注意生态保护,人类也不会产生相应的环保意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推进,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得温室效应越来越厉害,造成全球气温逐年升高,导致了北极冰川的加速融化。其实,这就是大自然首先向人类表达了自己的“认知”,警告人们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只不过,这种认知并非通过语言的方式来表达,而是以自然自身的方式在向人类发出信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谓“实践对真理或知识的检验”,实际上就是一个从客体(自然)到主体(人)再回到客体(自然)的一个循环过程。如果这一循环符合自然的法则,就是顺应自然的,否则就是相悖的。

在精神文化符号学看来,人类的认知活动过程中,自然(客体)是认知行为的发生者,而人是在受自然作用后才产生了相应的认知和思维活动。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实践活动中知识或真理的产生呢?真理并非是主客体的认知相符,而应该是客体(自然)对人的认知(主

体)的激活。早在《周易》中就有了“感而遂通”的认知模式,目的就是要避免理性的干扰,悬置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在“任运自然”“任运自动”的行为状态下,以达到心物一体的理想状态,即庄子所谓“听止于耳,心止于符”(郭象 2011: 81)。

在正向认知那里,人作为认知主体,首先接受到的是大量的外部世界印象。这些印象积累多了,经过逻辑推理、归纳和概括,甚至深入的分析 and 研究,就形成了某些概念或某种规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真理或知识。然而,在反向认知看来,来自大自然外部的大量信息是人类主体认知活动的根本,自然界激活了人思维中的“正确”认知就形成了真理或知识。当然,由于人的理性认知无法避免局限性,因此被“瞬间”激活的直觉往往被看成是生命真谛之所在。为了能够延长这一直觉的“瞬间”,按照庄子的说法,可以通过“实修”,真正进入直觉状态,延长直觉的时间,使直觉不再是“瞬间”的。“吾丧我”就是“实修”的过程。当然,这种“实修”却是需要高度的意志力的。这既是老庄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鲜明特质。

自然界在反向认知中作为信息行为的主动发生者,必然是体现某种生命力的。其实,反向认知就是把大自然视为是由各个生命体构成的“圜境”。新塔尔图符号学派的马格纳斯和库尔就明确指出:“圜境是生命体通过其特有的感知和运动系统而获致和创造的世界。根据乌克斯库尔的观点,生物学家应该描绘的那部分现实是由生命体自身构建的”(Magnus & Kull 2012: 650)。这里的“圜境”不同于达尔文式的“环境”。在达尔文那里,“环境”包括有机体、生命和作为其衍生物的进化。“环境”首先存在,然后出现了有机体,“环境”产生了生命。在乌克斯库尔的“圜境”中,首先存在的是有机体,是有机体创造了主体性世界,每种生物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拥有自己的主体性世界,相互作用并相互依存。在这个意义上,“圜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由生命体构成的大主体,而不只是被反映的纯粹物理性的客体“环境”。它是第一性的。

在反向认知活动中,人作为主体并非要从丰富多彩的“圜境”中归纳概括出某种规律或曰真理和知识,而是要在“吾丧我”之后,用心灵去感知大自然的真谛,让自己处于“用心若镜”的境地,并还意义以自由,而不是用符号表征某个确定的意义。“吾”丧“我”之后的“吾”就是有主体人格的得“道”之人,是“用心若镜”的“至人”。“道”就是一种效法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准则,把大自然放在优先于人的地位,唯以此才能够企及本真的自然。“道”就在自然中,却被“理”相隔离,只有瓦解现存的理性约束,包括知识谱系,才能进入“道”的境界。“道”可以释放符号的意义,规避“理”对意义的缺失,以与无限的宇宙相匹配的方法,探索自然之境。精神文化符号学坚持这种自然主体论,以庄子哲学思想中的“吾丧我”为基础,不再追求意义的确定,而是尽可能地释放意义,从而实现回归自然的目的(张杰、余红兵 2022)。

#### 4. 自然的回归:有限与无限之间

通常意义上的大自然,主要是指地球内的天然环境,与地球之外的地月系和太阳系有着一定的联系。然而,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自然与宇宙的关系也逐渐扩展,几近无限。那么,有限的人类认知何以把握如此无限的自然以及宇宙呢?难道人类在利用科学技术改造世界的同时,要返回到原始的生态环境中去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自然的回归与科技的发展其实并不矛盾,而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也正使得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可以无限放大,甚至超过人类的智力。正反向互动的认知思维模式早已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机器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王维嘉(2019)就按照知识的表征分类,把知识分成了明知识、默知识和暗知识。其中,前两者分别是可用符号表达的知识和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比如西医属于前者,而传统中医则属于后者。暗知识(王维嘉 2019: 27-32)则是既无法用符号表征,也不可感受的知识。这是机器发掘出来的暗知识,是现阶段人的大脑无法产生的知识。也正是因为暗知识,机器人才有可能战胜人类,就如同 AlphaGo 打败了世界围棋冠军,而 AlphaGoZero 又打败了 AlphaGo。

当今,在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方面,即获取暗知识,零样本学习(Zero-Shot Learning,简称 ZSL)可以算作一个机器学习方向的问题。这是由 Lampert 等人在 2009 年提出的,它追求不受任何人类样本的约束,经过训练数据组合,模拟人类推理的过程,其功能可以使得计算机具有知识迁移的能力,很符合自然生活中海量信息的存在形式(Lampert et al. 2009)。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简称 GAN)是众多机器学习的算法之一,其主要运用场所是生成和原样本类似的数据,是由 Goodfellow 和其他研究人员于 2014 年在蒙特利尔大学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介绍的。这是一种深度学习模型,该模型通过框架中至少两个模块,即生成模型(Generative Model)和判别模型(Discriminative Model),互相博弈学习产生相对好的输出(Goodfellow et al. 2014)。原始 GAN 理论中,并不要求 G 和 D 都是神经网络,只需要是能拟合相应生成和判别的函数即可。在生成对抗网络之中,生成模型就如同千姿百态的大自然,提出各种样本,形成与判别模型(人的大脑)的对抗。判别模型从生成模型那里获取信息,努力地学习如何按照人类的需要来正确区分真假样本,把判别结果返回到生成模式里去再增强生成器的欺骗性。这种往返的过程也就是正反向认知的互动循环过程。随着模型的训练,生成网络会不断产生在判别网络看来是更有欺骗性的图片。这些似乎是在干扰判别网络的因素,反而恰恰不断增强了该网络的辨别能力。尽管判别器自身也在不断提高,但由于自身模型复杂度的局限性,最终稳定状态下判别器的正确率会在 50% 左右(接近于乱猜)。它无法分辨到底是生成的还是原有的,而这又正体现了正向认知的局限性。当面对不断复杂化的问题,人的大脑由于受限制于自身的认知,很难做出正确的答案。

显然,无论是尽量避免人类主观样本限制的推理问题探讨,还是具有对抗性博弈的深度学习模型,都体现了从有限理性到无限自然的探索方式。因为只有“零样本”的推理才能够赢得更多,甚至无限的“样本”,而“对抗”和“博弈”则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学习中,对抗思想被成功引入,使得判别模型在深度学习乃至机器学习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实,要想让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用有限的理性思维去认知无限的自然世界,对抗性或批判性的接受,可能是一种理想的学习方法。

正向认知确实有着明确的局限性,因为在面对无限复杂的自然世界的问题,人的大脑由于受限制于自身的认知,很多情况下难以甚至无法给出做出绝对正确的解答。要想让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在以有限的理性思维去认知无限的自然世界的同时,精神文化符号学所倡导的具有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反向认知,可能会为我们打开一条较为理想的途径。这种自然到人的反向认知,我们还能将其运用到具体的教学理念中。比如,我们通常把学校看成是传授

知识的地方,也习惯这样说:“教师有一缸水,才能给学生一碗水。”就对教师的要求而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教师知识丰富,才有可能传授给学生更多的知识。然而,如果真的仅仅是这样,那我们岂不是会一代不如一代,最后甚至可能会出现“无水可给”的状况吗?其实,从反向认知的角度来看,“教师如果有一缸水,学生应该成为汪洋大海”,学生应该也需要超越教师。不仅教学者需要有这种反向认知的能力,我们也必须培养学生获得并提高这种能力。

回顾前文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向与反向认知的问题,我们重申:人类的认知能力源自于大自然,提升于人对自我认识的不不断批判。高等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应立足于此。圜境的力量是第一性的,是信息产生的源头。自然界不仅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意义内容,而且还展示了可感知的多彩形式。相对于人的理性思维而言,自然物种和感性体验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地。人的认知活动实际上是由客观世界到主观世界,再回到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

《道德经》曰:“反者,道之动。”(王弼2011: 113)这里自然存在着反向认知的哲理,但还应该返璞归真的含义,即“反”与“返”相通,让人摆脱自身认知的局限性,回归自然的本真状态,倡导自然孕育人,人再返回自然的轮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反”的思想不仅存在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之中,而且也反映在儒家等其他学说里。孟子的“反身而诚”的出发点就是“万物皆备于我”,即以自然为主体,这里的“我”是“吾丧我”中的“吾”,是“大我”。“吾”与万物融为一体,实际上就是要“丧”掉“小我”。北宋哲学家邵雍曾明确表示:“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以物观物之谓也。”(邵雍2012: 484)这一“反观”,就是要以物观物,从而达到任运自然的感通状态。虽然各家之间对“反”有着并非完全一致的解释,但无疑都与“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哲理相通,其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无思无虑始知道”境界。

如果放在我国高校的外语教学中,自然主体论的思维范式不仅在于揭示了从客体(自然语言)到主体(人)的反向认知过程,更重要在于表明自然的无限性、认知的局限性,从而进一步指出“回归自然”是战胜人类认知局限和知识再生的关键。即便落到最为基本的语言文化知识的习得层面,也应超越过于简单概括的语法总结和规范条文的记诵,而是必须通过具有无限复杂性的实际自然的语言生活和文化交流,来生成真正的知识与能力。因此,人才培养的目的,尤其是在高校的教学,并非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且更是对现存知识的批判,主要不是为了弄清知识或真理,而是更多地去自省、反思和使用,同时思考产生知识和真理的缘由和途径。外语教学的任务,就是要超越传授语言知识和提升语言技能,转向更为注重学生获取知识和思维能力的提升。这种能力再生的前提和立足点就是应该从反向认知出发,尽可能瓦解现有固化的知识谱系和文化权力话语场,转向知识和意义的不断再生,面向未来,让学生的思维成为“可再生资源”。接班人的培养不只是从前辈手中接过接力棒,沿着前人的道路继续跑下去,而是要不断更新理念,探索新的路径,超越前辈。

#### 注释:

①关于现代符号学中Umwelt一词的汉译,本文取余红兵《符号建模论》第三页脚注2中的译法。

## 参考文献:

- [1] Goodfellow, I. et al. 2014.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s[A]. In Z. Ghahramani et al. (eds.). *NIPS'14: Proceedings of the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Volume 2[C].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2] Lampert, C., H. Nickisch & S. Harmeling. 2009. Learning to detect unseen object classes by between-class attribute transfer[A]. In *Proceedings / CVPR, IEEE Computer Society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C]. Miami: IEEE.
- [3] Magnus, R. & K. Kull. 2012. Roots of culture in the umwelt[A]. In J. Valsin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lture and Psychology*[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 Maran, T. 2007. Towards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of ecosemiotics: The concept of nature-text[J]. *Sign Systems Studies*, (1/2): 269-294.
- [5] Sebeok, T. & M. Danesi. 2000. *The Forms of Meaning: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and Semiotic Analysis*[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6] Лихачев, Д.1992. Искусство и наука (мысли)[J].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3): 3-13.
- [7] 陈鼓应. 2020.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 [8] 福柯. 2021. 严锋译.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修订译本)[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9] 郭象. 2011. 成玄英疏. 曹础基 黄兰发点校. 庄子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 [10] 胡塞尔. 1986. 倪梁康译,夏基松 张继武校. 现象学的观念[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1] 黄寿祺. 2016. 周易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2] 邵雍. 2012. 皇极经世书[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 [13] 王弼. 2011. 楼宇烈校释. 老子道德经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 [14] 王弼 韩康伯. 2009. 孔颖达正义. 周易正义[M].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 [15] 王维嘉. 2019. 暗知识:机器认知如何颠覆商业和社会[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 [16] 王先谦. 2012. 沈啸寰点校. 庄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 [17] 张杰 余红兵. 2022. “用心若镜”与意义释放——再论精神文化符号学的任务[J]. *江海学刊*, (3): 241-247.

nally changes into a new word meaning through conventionalization. Breaking the (post-)Gricean tradition of the principle-based inferential model, this study proves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meaning cannot be strictly divided, and the generation of default meaning is a process of diachronic change from individual contextualization to collective conventionalization.

**Key words:** default meaning; diachronic change; pragmatics; cognition

**Time Cogni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Grammatical Specificity or Pragmatic Universality?**, p.33. *XUE Bing & ZHANG Shaoji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both specificity and universality of time cognition underlying English and Chinese. Firstly,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im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arly controversy between Linguistic Relativity and Universal Grammar in explaining time cognition. Then, three recent views of Chinese temporal-spatial grammatical specificity (namely the “space view”, the “time view” and the “space-time conflation view”) are critically reviewed, considering their conflicts and respective limitation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drawing on Jaszczolt’s idea of “pragmatic universal” in temporal refere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grammatical specificity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pragmatic universality in explaining time cognition across languages. Specifically, the specificity of temporal cogni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anifests in different choices of grammatical-pragmatic resources in time expression, while the universality common in language use resides in grammar-pragmatics interaction in temporal conceptualization. Lastly,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 of specificity-universality integration is also examined. The account of integrating grammatical specificity with pragmatic universality sheds new light on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temporal cognition.

**Key words:** English and Chinese; time cognition; grammatical specificity; pragmatic universality; integration

**Reverse Cognition: On the Natural Subjectivist Paradigm of Knowing**, p.43. *ZHANG Jie & YU Hongb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long presupposed human cognition as the one-dimensional process of knowing the object of learning and even nature. The truth is that if we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the human being in a reverse order, cognition originates in nature, without which there would be no ground for any cognitive activity. How does this reverse cognition unfold between nature and the human being? Can nature, as object, truly possess its own cognition and, if yes, how is this cognition expressed? The present paper, grounded on Natural Subjectivism, addresses these questions by integrating concepts and ideas from *I-Ching*, philosophies of Laozi and Zhuangzi as well as ecosemiotics. It explicates reverse cognition, a mode of knowing that stresses the cruciality of “returning to the natural” in combating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mind, generating knowledge and enhancing mental power.

**Key words:** reverse cognition; Natural Subjectivism;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philoso-

---

phies of Laozi and Zhuangzi

**The Introduction of Linguistic Approach and the Pursuit of Scientificity in Literary Studies**, p.52. *SHANG Biwu*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21st Century are characterized by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symptomatic reading, advocacies of a post-critical turn, and emphases on textual agency on the one hand, and a continuous call for scientific, objective approaches to literary studies on the other. This pursuit of scientificity in literary studies is largely manifested in the introduc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s, especially those borrowed from linguistics, and narrative studies serve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is phenomenon. Where do the scientific qualities of literary research reside? How do literary studies borrow from linguistics, its nearest neighbor, to enhance their scientific qualities? What lies behind this pursuit of scientificity, and where may it lead to? This article makes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hese issues.

**Key word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literature; linguistic approach; narratology; poetics; interpretation

**Digital Humanities in Linguistic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Small Tent”**, p.63. *LEI Lei*

Digital Humanities in Linguistics is a new research area where digital techniques and methods are used to ask or address questions in linguist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If Digital Humanities is a “big tent”, then Digital Humanities in Linguistics is a “small tent” under the “big tent”. Digital Humanities in Linguistics is cross-disciplinary in nature, and new knowledge is generated under the “small tent”, with wisdom and methods from disciplines such as linguistics, literary studies, translation studies, computer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sociology, psychology,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owever, since its theories still need to be elaborated, Digital Humanities in Linguistics has far from become a discipline in its own right. Against this backdrop,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in terms of possible composing elements such a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pplied research,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t is argued that,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Linguistics, the discipline versus methodology controversy should be avoided. Since Digital Humanities in Linguistics is practice-oriented, we may need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with more applied research and infrastructure works, which may also help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Key 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in Linguistics; “small t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new liberal arts

**Human Intelligence Advantages in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 Corpus-Based Comparative Study of Human Translatio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p.74. *LIANG Junying & LIU Yiguang*

The present corpus-based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products in terms of multidimensional linguistic features, including lexi-